

理论与宣讲

LI LUN YU XUAN JIANG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编印

总第20期

● 卷首语	
学要学到位 做要具体化	(1)
● 学习之窗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思维	(2)
大逻辑·大主题·大视野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关系	(14)
读懂世界 紧跟时代	(18)
● 宣讲超市	
“两学一做”如何落到实处	(23)
● 宣讲交流	
要有触及灵魂深处的力量	(28)
“入脑”须“入耳”	(31)
● 读书与思考	
为政乐读 改变干部气宇格局	(34)
忧世之心 笑骂之言 劝善之意	(37)
● 理论特辑	
我国处于“脆弱性战略机遇期”	(41)
参与全球治理处理好几个关系	(44)
“四条底线”让从政者更有“底气”	(44)
社会转型的代价	(45)

学要学到位 做要具体化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学要学到位；关键在做，做要具体化。

要学得到位、做得具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需要全覆盖、常态化、重创新。全覆盖，就是面向全体党员，不能有空白，留下盲区。不仅领导要学、普通党员也要学，不仅在职的要学、退下来的也要学，不仅机关事业单位要学、工厂农村部队也要学，让每一名党员都能主动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常态化，就是经常性教育，不能一阵风、“雨过地皮湿”。“两学一做”不是一次活动，是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建设，需要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不能说搞学习教育时和我有关系，搞完了就和我没关系了。重创新，就是创新方法手段，不能一刀切、“大水漫灌”。在学习教育中要“区分情况、分类指导”，运用手机、微信等新媒体、新平台，以新方式完成新任务。

全覆盖、常态化、重创新，目的都是求实效。“两学一做”是同党的建设、党内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是同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学”得好不好、“做”得合不合格，最终要体现在推动工作上。“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见效”，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不愿为、不想为、缺乏担当的问题，不会为、不善为、能力素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的同志，都是“两学一做”的准星所向。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结合实际对照和细化，边学边改、即知即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摘自201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1版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思维

李永胜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乘风破浪，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实践成果，这些实践成果的背后蕴涵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国际国内关系、成功驾驭中国社会航船进行治国理政的新思维，为我们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南。这些治国理政的新思维主要有：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思维。所谓价值思维，就是指以价值关系为轴心的思维，其思维路径是以价值关系为思维运作的依据、出发点和归宿，以此观察、分析、处理和解决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思维，就是以人民利益为轴心审视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以此作为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尺度与标准。价值思维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起着驱动、规范、制约和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体现在

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此等等，这些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至上，以人民幸福为价值旨趣与目标的执政信念，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思维，折射出“为人民”是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人民性”是党的一切工作永恒的价值底色，体现了真正把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及其价值消费主体的浓厚价值意识，传承和发展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彰显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开创了执政为民的新境界，为新时期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根本价值指南与行动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思维，就是要求我们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创造，自觉地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价值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综合集成的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于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运用系统方法与整体方法，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统筹谋划，系统设计，把目标与举措、路径与方法、战略与操作等有效集成，使之形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层层递进、耦合互动、协同发力、一体联动的有机整体，优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结构，使之涌现出新的整体功能，体现出综合集成的系统思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运用综合集成思维，针对世界经济复苏低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立足全局，统筹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科学发展而开出的治理良方，它系统设计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全面建构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逻辑。“五大发展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一体坚持、

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代替。”这些思想，都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系统整体层面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综合集成思维，彰显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撑”，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也都是运用综合集成思维为创造性解决我国结构性改革关键问题、以谋求社会现代化系统的整体优化提出的改革设计思路与举措，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面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性系统，我们迫切需要综合集成的系统思维和全面性、整体性研究方法加强各项措施的系统集成，从而有效破解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难题，以实现综合施策、联合攻关、协同工作、一体联动、整体推进。例如，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我们更加注重一体构思、统筹谋划、综合集成的系统思维和系统集成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不能畸轻畸重，或难以单兵突进”。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保持锐意创新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加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措施系统集成”。这是对综合集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综合集成的系统思维方法，深刻体现了在社会多元化、利益差异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场景中，着眼于全局、系统、整体优化的大局，以最大公约数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优化配置、系统集成、综合创新，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与资源，实现系统整体最优化的科学方法。

三、精准思维（精细化社会治理思维）。当今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文明多样化、社会多元化、利益差异化、生活个性化日益

凸显，产业内部分工日益精细化，生产方式走向柔性化、智能化、个性化和精细化，集约化经营、精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精细化治理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大数据挖掘、分析与运用技术也对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基础保障。对此，学界提出了精细社会的理论，其核心要义是“精、准、细、严”，它要求制度设计要从“大而全”转向“小而精”，政策运行要立足乡土逻辑，社会治理要精准施策、精准配合、精准发力，实现精细化治理。精细社会的实践呼唤精准思维。精准思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道德经》有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可见，成大事者必以精准思维、精准作法为行为遵循，方见成效。《礼记》也有载：“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精准思维的精髓是求真、务实、准确、到位，穷尽所能，做到极致。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重视精准思维，一贯追求精准化做事方法。2014年5月9日在视察中办时他指出：“要牢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的道理，无论办文办会办事，都要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于细微处见精神，在细节之处显水平”。2014年5月9日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时，他又强调，“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隆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贫困问题治理方面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贫攻坚战略，他指出：“扶贫开发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他在干部作风建设问题上提出“八项规定”、“三严三实”，强调对干部进行“精准化培训”；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他提出“主动出击，贴身紧逼，精准发力”，“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他还提出“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果”，他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精准

有力”。如此等等，都是自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与潮流，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审时度势、应势利导、乘势而为，着力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精准思维。精准思维的关键是聚焦“精准”，它要求善于捕捉精准信息，实现精准认识、准确判断、细处着眼、实处发力、精准施策、协同推进，从而实现精细化社会治理。精准思维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具体和准确，要求动作精准、工作到位，在一个个具体的点上解决问题，积小胜为大胜，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确立精细化（精准化）社会治理思维，意味着社会治理进入“精耕细作”的新阶段，它有助于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人性化，提升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效率，加快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步伐。

四、质量效益取向的实践思维。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从数量规模扩张型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变。在此背景下，治国理政既要注重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也要重视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与实际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改革要“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吃透中央制定的重大改革方案，同时完善落实机制，从实际出发，从具体问题入手，见物见人，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使改革落地生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实干、苦干、求真知、说真话、办实事、求实效”，“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说真话、报真情、办实事、求实效”。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他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要办实事、讲实效，紧紧围绕促进人民福祉来进行，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他在2016年新年贺辞中说：“更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质量和效益，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好这些工作，关键是要五大发展理念进头脑、进决策、进行动，真抓实干，取得实效”。这些观点深刻地体现了他求真务实、承接地气、以质量效益为取向的实践思维，体现了他更加注重狠抓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努力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的唯实精神，为新时期

治国理政提供了牢固可靠与切实管用的思想支撑与行动保障，必将引领我们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干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在蹄疾步稳中获得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五、问题导向的矛盾思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为解决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针对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不和谐、实现内外联动问题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提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针对需求与供给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问题导向是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思维方法，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总结。在治国理政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体现了他自觉鲜明的矛盾思维。他指出：“聚焦问题，抓住关键，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并强调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深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敢于直面问题，矛盾面前不躲避，挑战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这一系列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思维与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回避的。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是，直面矛盾，迎难而上，善于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分析事物、研究矛盾，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破解难题、推动事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背后，反映的是求真务实、正视矛盾的科学态度，是直面问题、敢于担当、挺身而出的责任意识，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攻坚克难的主体能动精神，是自觉清醒的忧患意识与励精图治的勇气智慧，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创新魄力。问题导向的矛盾思维是我们党直面矛盾，回应挑战，攻坚克难，科学驾驭中国社会发展航船，乘势而

为，因势而进，披荆斩棘，不断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的思想法宝。它为我们提供了直面现实、捕捉问题、发现问题、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

上述治国理政的新思维、新方法，以鲜活生动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创造、中国魄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想基石。深入研究并不断提炼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新实践中形成的思维方法与规律性成果，将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来 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16年5月7日）

责任编辑：陈 文

大逻辑·大主题·大视野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鲜明特质

包心鉴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勇立时代潮头，驾驶“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奋勇前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了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全面完整地宣传阐释其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彰显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从今天起，本刊将同时开辟“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和“微言”两个专栏。前者拟采用重点理论文章、学术笔谈和专家访谈等形式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后者则通过“名家”写“小文”，用清新活泼的方式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深度解析，敬请广大读者垂注和赐稿。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遵循着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起来的大逻辑，深蕴着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机统一起来的大主题，凸显着把创造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包容世界多样文明有机融汇起来的大视野，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强大思想武器。

大逻辑

——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一定的时代提出一定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发展，问题在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继续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开拓前进的着力点，亦即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我们面临的总问题、总任务是要继续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而要做好这篇“大文章”，就必须深入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层面建构和完善我们的制度体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党的以往理论与实践，有所涉及、有所回答，但并不系统，甚至并不清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实践眼光，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创新引领，创造性提出并初步回答了这一重大问题。他精辟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具有历史开创性。毫无疑问，这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正是遵循这样一个“大逻辑”而展开的。

大主题

——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机统一起来，深入开创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新价值境界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理论体系中，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居于统领全局、引领未来的重要位置。作为顺应时代潮流、凝结中华儿女夙愿的宏伟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价值深深融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实践之中。把实现中国梦与“四个全面”有机统一起来，深入探索当代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价值问题，不啻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所深蕴的大主题。

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要素的治国理政价值追求。现代化从其本意来说，就是实现和满足人的现代需要的行为和过程；因而现代化的最高指数和根本标准是人的现代素质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出发，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揭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新境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质是“发展”，这个发展，核心内涵是人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全面”，这个全面，核心内涵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制度现代化为关键环节的治国理政价值目标。“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优化治国理政的最重要措施和最精彩篇章，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而深远的价值意义就在于，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促进体制和制度现代化，从而为整个社会现代化建构起优质的制度架构，确保我国现代化大厦不仅外形壮美，而且内构永固。制度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着眼于从国家治理层面不断拓展民主建设路径，为人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愈益完善的制度保障，使人民有更加切实的权利获得感，进一步固化了制度现代化的价值指向，为全面实现当代中国现代化指明了正确方向。

以法治现代化为根本保障的治国理政价值坐标。现代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优化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这两次重要全会、两个重大战略，一脉相承、相互联系，生动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本质问题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

以党的建设现代化为决定因素的治国理政价值自觉。全面从严治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优化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也是突出亮点。全面从严治政，其实质就是开辟党的建设现代化新境界，确保我们党经得起各种考验，始终走在现代化前列。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自我担当精神，从严要求抓党建、从严管理抓干部，“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取得了突出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

大视野

——把创造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性吸纳世界多样文明有机融合起来，深入探索遵循人类文明大趋势优化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

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文明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彰显了博大的文明胸怀和宽广的文明视野，凸显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治国理政大智慧。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必须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之转化为当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元素。在新时期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鲜明渗透着和体现着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是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民为邦本、以民为本，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基础；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居安

思危、改易更化，是治国理政的强大动力；勤政为民、夙夜在公，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精神；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素。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经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倡导和全党的躬身实践，已经有效地内化为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外化为党的治国理政形象。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人类文明具有多元性、平等性和包容性，必须以博大的文明胸怀和宽广的文明视野对待世界各国文明，使之成为优化治国理政的重要借鉴。对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作出科学揭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判断。文明的内生力在于与时俱进、交流互鉴。站在人类现代文明高度对中国梦作出科学定位。“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命运、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梦正是中华民族追求更高文明的历史性选择。这个更高文明突出体现在，“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是和平而不是动荡，是进步而不是倒退；“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己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实现中国梦既是对中华民族负责，也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归根到底，中国梦是追求文明的梦，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均衡发展、整体推进的过程。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必将在更高文明基点上造福全体人民、推动文明进步。

来 源：《光明日报》（2016年5月11日13版）

责任编辑：宋武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关系

郝全洪

(作者系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

从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到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界一项现实而重大的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等在内的系统综合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基础上，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经济建设实践和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经验和素材，中国经济新常态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建构提出了鲜明的时代课题，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学说体系的建构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建构不仅将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

要的理论指导，也将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学说体系建构的节奏和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指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也可称之为马克思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如《资本论》等，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经济学创立以来所有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继承和发展的经济学说体系，包括前苏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斯大林经济思想中正确的部分、中国毛泽东经济思想、邓小平经济理论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广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开放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星火传承，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坚持和继承，更是其在当今中国最新的创新和重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处于不同的时代和背景，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一样，解决的时代课题不相同。马克思经济学的使命主要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预言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有条件的、理论逻辑上的推测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新成果，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指由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成的微观经济学与由凯恩斯主义发展而来的宏观经济学的合称。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指自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以来，到萨伊将

古典经济学庸俗化，再到边际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再到现代新自由主义等在内的松散庞杂体系的笼统称呼。

广义的西方经济学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内在联系。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并由大卫·李嘉图将其发展到巅峰，但“李嘉图两大难题”也直接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破产，此后，经济学便沿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由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以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巨大的逻辑力量解决了“李嘉图两大难题”，并发展为后来的狭义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另一个方向是由庸俗经济学代表萨伊、边际学派代表门格尔、新古典经济学代表马歇尔等等绕开对“李嘉图两大难题”的回答，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混杂拼凑而延续至今的狭义和广义的庞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本是同源，但在是否继承劳动价值论问题上出现分野，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最终形成了逻辑严谨、科学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李嘉图以后的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放弃了劳动价值论，逐步形成内容庞杂、表面繁荣，实质矛盾林立、危机重重的松散庞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有关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内含着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具有深刻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逻辑和分析

方法；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层面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要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从理论上系统归纳和合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显著成就和存在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探索形成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步形成科学有机的理论体系；要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期待，以强烈的理论自信、开放包容的理论胸怀、坚定的理论创新勇气和决心，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道路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来 源：《学习时报》（2016年5月5日）

责任编辑：赵志斌

读懂世界 紧跟时代

汪仲启

大家知道，今天中国的发展局面缘起于改革开放，然而，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与未来却在于中国是否读懂了世界。当年，邓小平用“和平与发展”来总结新时代的国际局势主旋律，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已经准备打开封闭的双臂，拥抱世界。如今，无论全球局势还是中国发展都又到了一个新阶段，能否准确理解世界，事关中国未来。读懂变化万千的世界，首先是学者的责任。2015年年末，由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共同举办，社会科学报作为独家媒体支持的第一届“读懂世界”上海论坛如期举行，上海学术界十多名重量级学者悉数登场，向百余位学界中人，讲述他们眼中的世界景象。

读懂世界需要“慧眼”

公元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携访华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来到清廷，请求扩大通商。这一年，是乾隆皇帝执政的第五十八个年头，这位精力充沛多才多艺的老皇帝正见证着“康乾盛世”的末期。此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规模达到3亿之巨，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而此时的英国，人口尚不足千万。面对英人在帝国首都开设使领馆以及口岸通商的请求，年迈的乾隆帝深感不爽和不屑。他回复对方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这段话说得委婉得体，却又盛气凌人。老皇帝不知道的是，这个“蕞尔岛国”已经处在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哨。早在60年前，英国人约翰·凯伊就发明了飞梭，1785年埃德蒙·卡特莱发明了蒸汽驱动的织布机。工业革命后，人类面貌和满清朝的命运都将为之大变。仅仅57年之后，英国人就凭借坚

船利炮刺破了帝国苍老的肌肤，并从此将帝国强行卷入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之中。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误读世界、误读时代的悲剧。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面对一些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口，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假如在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国就更加积极地向外部世界学习，而非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历史的走向会不会有所不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初现的今天，如果我们对世界潮流和局势变化发生误判，有无可能使我们重蹈历史覆辙？就像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我国著名理论家郑必坚教授所说，今天的中国已然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将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读懂中国”同“读懂世界”两者不可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对于“读懂中国”，国际社会有强烈的愿望和需要，但是中国人何尝不需要“读懂世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读懂时代”，时代永远在前进，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读懂世界”和“读懂中国”都是无止境的大视野。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燕爽也表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变化，中国要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建设者、参与者，就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必须对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文化、发展状况以及民族风情有深刻的认识。因此，无论对内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对外参与全球治理，都需要我们进一步面向世界，更好地“读懂世界”。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李琪教授表示，读懂世界需要一双“慧眼”，而学术界的专业性研究不可或缺，“经过学习、思辨、批判、扬弃、借鉴而形成的观点，就是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观”。

未来的主导产业：科技还是生命？

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公报全文共有 29 处提到“创新”，足见中央已将创新列为时代的核心潮流。但是在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四个方面，到底谁是引领性的？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院长朱晓明认为，科技

创新是四大创新的“牛鼻子”。要读懂世界，就一定要了解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与方向。在数字化互联网年代，用户思维、迭代思维、平台思维、免费思维、分享思维大行其道，大数据通过精准挖掘甚至可以预测未来。3D打印、移动机器人、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方兴未艾。“在这样一个知识丰裕、财富丰裕的时代，最终剩余的会是人吗？”朱晓明问到。中科院院士、华东师大褚君浩教授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的特征就是量子力学、相对论、原子物理、信息技术和激光技术发展”。目前，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从技术发明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缩短。计算机锯齿效应1985年被发现，1998年实现技术应用，2007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教授说，按照牧业、农业、工业的产业革命顺序，如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或可以称为“科业”——科技创新正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

不过，对于国内的科技热，特别是互联网热，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提出了警示。在所有经济周期里，主导产业都是能够进入千家万户的最终消费品，而不是工具体系，比如流水线。今天讨论的互联网，不是最终消费品，不可能进入市场，“所以把大量的钱烧在互联网上是资源错配。”任何一个大国绝对不可以没有工业，没有工业的国家就是没有脊椎骨的软体动物，在世界竞争当中站不直。随着物质的丰富，人类将来最缺的是健康和长寿，所以生命、医药、健康产业必将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

世界不仅仅是指西方

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但他并非说历史已经到了尽头，而是指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那就是自由民主。然而，三个事实打破了西方人的自信：中国崛起、全球金融危机、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教授提醒，中国谈论世界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把眼光放在西方，“第三世界也是构成世界图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在理解外部世界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内在视角。特别是21世纪，我们很难完全把握西方的主流，很明显“西方具有多样性和差异

性”。

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贡献率来说，发达国家在上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下降。基本格局是美国向好，欧洲见底，日本恢复，俄罗斯萧条，印度强劲，中国走向平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杨洁勉教授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依然没变。但总的来说，时和势在我们这里。“我们要认清时代潮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不断努力读懂中国和世界，如果不抓住机遇，不善用这个时和势，它也会离我们而去”。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表示，21世纪的世界秩序，核心概念是全球化，跟全球化相对应的是全球治理。“作为秩序总是讲安全，但是21世纪的安全跟20世纪完全不同，非传统安全上升为主要威胁，传统安全威胁下降，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说，目前，伊斯兰国家处在十字路口，面临三种路径选择：一是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近五年来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已经否定这条道路；二是片面强调暴恐方式的圣战，试图建立复古主义的、沙拉非主义的塔利班主义；第三条道路是跟上时代，确定自己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这条通过改革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的穆斯林都已经认同并且主张进行改革，但是伊斯兰改革创新涉及的层面过于广泛，而伊斯兰国家的数量也多，国情不一，很难齐头并进。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冯绍雷教授则介绍了俄罗斯的相关情况。冯绍雷表示，尽管遭受油价下跌和美欧制裁的双重打击，但俄罗斯能源产业的短期经营状况总的来说表现良好，除了利润率之外，几乎所有的经营指标都表现稳定，甚至有所改善，这个情况和多数预判相左。另外，关于普京政权的前景，最新的民调显示，普京支持度是85%，俄罗斯人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达到88%，对本国军队支持是85%。现在不少人认为，2018年普京继续就任的可能性非常大。

欧洲曾经通过一体化来增强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当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但是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展，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在衰竭。同时，

因为难民问题和反恐问题引发的内部分歧在继续深化，这使得欧盟的一体化变得困难重重。上海社科院徐明棋研究员表示，对于拥有5亿多人口、巨大经济体量的欧盟来说，吸纳100多万难民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难民问题挑动了欧盟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深刻分歧。面对当前的种种冲击，欧盟的外交、内政以及社会政策产生了撕裂，“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深层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

作为尝试，首届“读懂世界”论坛的举办得到多方面的关注。论坛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平台作用，集聚更多学者，为深入读懂世界、理解世界而努力。

来 源：《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4日）

责任编辑：宋海萍

“两学一做”如何落到实处

姚 桓

（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2016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学习教育方案》。这是继十八大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党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

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背景和意义可以这样理解：值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形势和任务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当务之急的问题是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多数党员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是在思想上，少数党员思想活跃中有混乱和模糊认识，可能会妨碍党的路线贯彻执行；在组织上，庞大的党员数量同战斗力不成正比，少数党员素质不高，有的不合格或不完全合格，影响战斗力发挥；在作风上，“四风”依然存在，有时隐性化，表现出一定的顽固性。事实表明，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在抓好领导干部的同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扩展，从集中性教育活动向经常性教育活动延伸。原因很简单，“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十八大党章）；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是由广大党员的先进性决定的。所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性举措，是共产党的自我净化、自我提升。刘少奇同志指出，

“如果把我们党比作一个人的机体，这是个充满活力的机体，它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医治那些暂时地局部地感染到的病毒，而且在医治病毒之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赋予党有自我净化能力，这种能力需要恰当、科学的形式才能发挥出来。开展“两学一做”，就是通过学习，调动党员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自我净化和提升。这是注重思想建党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建党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反映党中央正视问题，突出问题导向，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坚定信心，是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举措。

关于学习党章党规。党章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活动和自身建设总规则，具有高度的权威性、科学性、全面性。党规包括准则、条例、规定、决定、指示、细则等，是在党章指导下制定的，是对党章的具体化和补充。党章和各种党规相结合，构成党的规范体系。有了全党共同遵循的党章党规，全党才能保持政治思想的统一、组织的团结和行动的一致，发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优势，领导全体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不断取得胜利。

关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于讲话中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标准。如果说党章是立党之本、行动之规、执纪之尺、对照之镜、是根本的“护党之宝”；那么系列讲话就是新形势下全党工作的指导原则和思想指南。

关于做合格党员。这就是要求用党章的规定和要求，用系列讲话的思想和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达到合格党员标准，成为合格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为此，最重要的是把握这三个关键

词：理想、宗旨、纪律。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并且规定了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员的理想信念，对党的事业的热情和忠诚，必须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具体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行动上。二是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足本职岗位做出贡献。三是严守党的纪律，强化“看齐意识”。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2015年10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的纪律列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类别。其中，规定生活纪律是有充分根据的，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党章《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规定，盟员的生活方式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十八大党章要求党员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发扬社会主义风尚、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也提出了生活纪律的要求。从实际生活看，腐败分子、严重违法违纪者往往集政治退化、经济贪婪、生活奢靡于一身，其堕落又常常是从生活腐化开始的。因此规定生活纪律，对共产党员提出生活纪律方面的要求，既是反腐倡廉、保持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

切实开展好“两学一做”，首先要有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尽管党员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过程，但是用尽可能高的标准去要求，就可能不断取得进步。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才能防止走过场，真正有收获。相反，标准不高、要求不严，会使能够做到的事情也做不到了。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从严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经济上放开，思想上放松、管理上放任，最后导致少数党员干部行动上放纵，堕入违法犯罪的深

渊，这是非常重要的深刻教训。缺乏严格要求的结果，甚至会引发“破窗效应”，放松要求乃至放纵自己的人越来越多，歪风邪气屡禁不止，坚持原则的同志受排挤，政治生态出现问题。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反腐倡廉和整顿作风方面重拳出击，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解决，使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事实再次证明，只要恢复“共产党最讲认真”的传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能够收到实效的。

其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人的行动来自思想，我们党历来是注重从思想建党入手的。因此第一位的任务是学习好。对党章和系列讲话，要系统深入学习，把握精神实质，融会贯通，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认识提高了，做合格党员才有自觉性。

再次，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口惠而实不至，言行不一，历来为人所不齿。担当改造世界大任的共产党人更要如此。共产党人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者，党员先进性的可贵，就是知与行的统一。刘少奇同志在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过一个例子。一个孔孟之道的信徒讲，孔子的话学了那么多，只记住两句话、相信两句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别的都不相信。那么自己不信的东西为什么要对群众讲呢？这证明了剥削阶级的虚伪。刘少奇以这个例子告诫党员，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落实到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结合上。我们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也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应该牢记，做一名合格党员胜过无数高谈阔论。

要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就是要在严肃认真学习基础上，澄清模糊认识，克服消极情绪；再把提高的认识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坚定信念。

最后，坚定信心，从我做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者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

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段富于哲理的话破解了旧的唯物主义的一个难题：“改变环境需要人来进行，而人又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如此，会陷入“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马克思把实践观点引入这个领域，证明人在实践中改变环境，人在实践中提升改造自我。目前，从党内环境和社会环境看，尽管存在不正之风和消极现象，但是总的来说都是有利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党内的制度导向是明确的，而且日臻完善，给广大党员提供了行动之规；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净化，正气上升；主流媒体在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而且作用不断强化；社会大多数人坚守伦理底线，对大是大非有明确的判断；社会道德发展总趋势是“爬坡”而非“滑坡”；市场机制和法治也在逐步健全完善过程中。这些，对我们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非常有利的。因此，正确的态度是“坚定信心，从我做起”。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时，曾经极为诚恳地表示态度：“我自己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这样的态度值得学习。全体党员都要这样做，互相监督、促进、鼓励，就会形成强大的正气氛围，推动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再上新台阶，给党的事业增添无限的光明前景！

来 源：宣讲家网站71.cn

责任编辑：潘建红

要有触及灵魂深处的力量

沈小勇

（作者单位：杭州市委党校）

本人讲授的课程《汲取传统从政修养，涵养现代党性品格》被评为“全国党校系统第一届党性教育精品课”，这对我既是一种肯定和荣誉，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我想，无论从什么学科角度切入，只要紧紧抓住党性教育课“要触及灵魂深处”这一核心理念，我们的党性教育课程就能激发学员深思，学员不仅不会产生反感，反而能够真正从心灵深处产生触动，并由感性上升为理性，从而激励学员自觉打扫政治灰尘，强化党员意识，净化思想灵魂，切实提升自我党性修养。

在准备、思考和讲授课程的过程中，我主要有三点体会。

讲好党性教育课程要紧扣“五大标准”，关键要突出“思想启迪点”。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教学的主业主课，党性教育更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在新的时代要求下，讲好党性教育课程就是要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意识，突出党章和党规党纪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引导学员提升政治修养、道德修养、法纪修养和作风修养等。根据这样特定的目标，党性教育课程要吸引和打动学员，就要紧紧扣住“讲题与党章照应，案例与学理融合，历史与现实贯通，启示与警示并重，讲授与互动兼顾”这五条标准，在课程选题、讲授内容和讲授方法上体现出党性教育课程的要求，特别要注意突出讲授专题的思想感染性，既以情动人，更以理感人，不能就党史谈党史，就党建谈党建，而是要聚焦到党性教育特别是党性修养上来，找到“思想的启迪点”，让“思想”引发“深思”，让“思想”代替“说教”，让“思想”

浸入“心灵”，力求润物细无声，让学员真正明理、悟道，在内心深处有所思考和触动。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授为政修养课，关键要设计“课程突破点”。党性教育重在思想的感染性，从传统文化的学科角度讲授党性教育课程，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挑战。我进入党校工作以来，一直试图作这样的尝试，先后开设了《传统文化与领导修养》《信仰建设与精神家园》等课程，在讲授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如何把传统的“修身论”改造为共产党人的“修养论”，对于今天讲好党性修养课程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因此，在准备《汲取传统从政修养，涵养现代党性品格》这门课程时，我特别注意要紧紧抓住传统“修身论”的精华，围绕“修身立德的为政价值论、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清正廉洁的道德实践论和理想追求的生命境界论”这四大传统从政修养学说的启示展开课程框架，力求设计好“课程突破点”，在课程理念、学术框架、时代启示等方面加以突破。通过讲授要把中华传统从政修养学说的智慧挖掘出来，让学员对传统的修身思想特别是修身哲学有所把握，并能真正有所启迪。

要讲透党性修养的“中国哲学智慧”，关键要找到“心灵共鸣点”。设计课程框架是基础，找到课程与学员的“心灵共鸣点”则是关键。要讲透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关键要讲透其中蕴藏的中国哲学智慧及其启示，只有找到“心灵共鸣点”才能让课程真正打动学员。比如，在讲授“修身立德的为政价值论”中，如何让学员通过学理和正反案例深入理解“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的道理则是“心灵共鸣点”；在讲授“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中，如何让学员深入理解要从内心深处先修炼自己的志虑，真正做到内心深处的“知行合一”则是“心灵共鸣点”；在讲授“清正廉洁的道德实践论”中，如何让学员真正悟到“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样的先哲道理则是“心灵共鸣点”；在讲授“理想追求的生命境界论”中，如何让学员深入体会“为政以德，安贫乐道，乐以忘忧，勇于进取，不忘初心，从而实

现自我的生命境界追求”这样的道理则是“心灵共鸣点”。我想，只要我们在讲授中善于挖掘和分析这样的“心灵共鸣点”，就能真正发挥党性课程的特殊教育功能，就能让学员真正在灵魂深处有所启迪和触动。

来 源：《学习时报》（2016年5月9日）

责任编辑：胡剑锋

“入脑” 须 “入耳”

张首映

这次到延安干部学院学习，一个突出感受是，老师能说会道，讲得好。

这个班名为“高级专家班”，50多人，有院士、大学校长，有研究院院长、理论报刊领导，多是有名有位、善研能侃之士，“没有一个省油的灯”，个个却听得津津有味。

王老师用了大约140分钟，概述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分七大部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引领发展的新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讲义发给学员了，学员有了“导游图”，那些定位定义、概念理念、价值意义、引文出处、一二三四，边听边看，了然于胸；老师时而看看PPT，时而望望学员，讲这七大部分，如同讲述七大名胜，成竹在胸、如数家珍，画龙点睛、要言不繁，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到11点半，说“时间到了”，大家才缓过神来。

延安整风讲了几十年，听了若干遍；“老调新唱”，属“高难度”。陈老师讲，遵义会议前，党犯过四次错误，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41年、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党的高级干部经过多次革命斗争有了一定觉悟，党员人数由4万人增加到80多万人，特别是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整风的条件和时机基本具备，可以整风了，然后讲整什么风、怎样整、效果如何、今天怎样借鉴。这样还原历史、还原现场、还原情景，还原生活原态，把学员思绪带入整风场景之中，使大家身临其境，如场中人，想场中事。已到晚餐时，不舍离去。

在梁家河，参观习近平同志住过的3口窑洞。烈日当空，何老师戴着黑镜和“麦克”，讲怎样像习近平同志那样用真感情做群众工作。习近平同志担任村支书时，决心解决农村“用水难”“烧柴难”等问题。寒冬腊月，他第一个跳进冰冷洞穴，感动村民与他一起修造水池。看到《人民日报》有关四川绵阳建沼气池的报道，向人借钱到当地取经，几经试验，获得成功，成为“全省第一”。他22岁离开梁家河时，村民们泪流满面，“十里相送”。讲着讲着，老师热泪盈眶；听着听着，学员们满眶热泪。结论是：用真情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是践行“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的纽带。这样的现场教学，用真感情讲真感情，用真感情引发真感情，情景交融，情理交融，教学交融；有的放矢，收放自如。

三堂课，一宏观，一中观，一微观，具有代表性，都叫好，都叫座。好在哪？好在熟能生巧，还原本道，收放有效，讲艺精妙。

理论源于问答和辩论。以“听、说、读、写”来说，早期理论以“听、说”为主，“读、写”为主是后来的事，是固化深化“听、说”而不是消解“听、说”。先前的理论好多是具体的，抽象为主是后来的事，抽象具体更是近世所为。延安干部学院的老师们深谙此道，注重研究并提升演讲理论的技巧和艺术；“说、读”二分，把学员当主体而不是灌输个人主张的“市场”，把解说理论当真理探索而不生搬硬套，把讲义当剧本而不照本宣科，把抽象还原于具体而渐入抽象具体的佳境，把授课当艺术而不当冬烘先生，时而来点“掌故”，时而来点“噱头”，时而来点幽默，连带着手势和“秦音”，把“入耳”当课堂优先目标而把“入心”贯穿其中，循循善诱，循序渐进，让学员获得“入耳”“入脑”双丰收。

“读、写”理论是重要的，“听、说”理论同样是重要的。延安干部学院的讲解示范，对于破解理论宣讲难题提供了经验。该院正推行集体备课、集体听课、集体改进、作为绩效考核指标等措施。这样不断改进，逐步完善，积木成林，蔚然成风，我们的理论宣讲和传播就会取得更好效果。

“爱拼才会赢”。对于理论宣讲来说，会讲才能赢得学员喝彩，赢得听众喜爱，促进创新理论赢得人心、赢得受众。

来 源：《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1日 07版）

责任编辑：陈 阳

为政乐读 改变干部气宇格局

尹卫东

（作者为盐城市委组织部部长）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国是个诗书国度，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读书的溢美与渴望，放眼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通过“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应该说，官员读书问题在隋唐科举取士后就基本解决了，不读书或者书读不好一般是入不了仕途的。古代官员上朝议事、下朝读书，朝出鏖战、暮归讲道的佳话不绝于史。

古代早已解决的做官读书问题，如今在现代官员中却成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感慨读书“无趣论”者有之，与有思想、品级高的著作无缘结识，败坏了胃口，领悟不到读书之乐趣，反而归咎于书，对书产生轻视乃至盲目的排斥；借口读书“无暇论”者亦有之，陷于具体事务、忙于迎来送往，疏离书本、心浮气躁；更有甚者，宣扬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不读书、读多少书，与胜任岗位、职务升迁没有直接关联，甚至担心书读多了冒傻气、不圆融，自甘沦为不读书的“俗吏”。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重视读书学习，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一生读了10万多册书，不算宽大的卧榻之上，三分之一的空间被书籍占了。习近平同志当年在陕西农村插队时，曾为借阅一本《浮士德》，在乡间小路步行30里；担任总书记以后，依然读书不倦。他感言：“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根本上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气宇与格局。

现代社会是一个压力社会，个人得失、子女教育、生老病死，都会对我们的人生构成挑战、形成压力，官员更是时刻面临各种纷至沓来的矛盾和有形无形的压力。如何调适心理壅堵与焦虑？读书无疑是一剂“灵丹妙药”。有意识地选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能让我们在现实世界之外，拥有另一个更为辽阔、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明白现实中的不平失意，乃至仕途上的起起落落，皆为人生的常态，在历史长河中更是无足挂齿、不值一提，甚至若干年后，会对之莞尔一笑。长年阅读，含英咀华，会在不知不觉中温润我们的情怀、拓展我们的格局、提升我们的境界。我们会由此对读书油然而生一种“看似无用、实乃大用”的感喟。

“本领恐慌”，是现在许多干部面临的困窘。而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读书就是用千百年来的人类智慧浇灌你，用许许多多一流的脑袋帮助你。增才益智最根本的方法是读书。如果说古代是学而优则仕，那么当代更应该是仕欲优必学。干部不仅是职务，更是职业，既要有综合性的能力素质，更要有职业化的专业水准。对领导干部来说，理论上不去，工作终究上不去。夯实理论功底、锻造宏观思维，需要多读一些闪烁思想光芒的书籍，而其中最管用的无疑是哲学。诚如李瑞环同志所说，“哲学是‘明白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不学哲学，天赋再好也不能算明白人”。研阅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宏观世界就好似多了一副望远镜，总能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为眼前所障目；考察微观领域也比别人多了一副显微镜，看得更细、想得更深，不为假象所迷惑。

当然，做好本职工作，阅读专业书籍也必不可少。每项工作都对应着一门甚至多门学科。倘若能把专业知识上升到诸如领导学、旅游学、民政学等学科的高度，面对工作实践中的种种疑难杂症，就能突破经验局限，善于用共性规律来解决个性问题，始终把控主动权，做到登高望远、从容不迫。

做学问要读书，读书也是有学问的。千个师傅千种法。领导干部用于读书的时间相对有限，更要寻找适合自己的个性办法，力求事半功倍。首先，不妨耐着性子、硬着头皮啃一些“大部头”的理论书籍，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阅读诸如此类的理论“元典”，虽耗时费力，但似慢实快，练的是“内功”，收获的是“种子”。而攀登过这些“高峰”，弄懂了一些基本的“元理论”以后，再读其他的理论著作，会有“一览众山小”的轻松，就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一通百通。其次，还可以读一些当代有影响的名家著述。真正的名家，永远走在时代前沿、引领行业风气。他们的著作，充满思辨的智慧、逻辑的力量，既有质感和厚度，也有美感和热度。再者，可能的话，尽量把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古人讲，不动笔墨不看书。写与读是天然的吐纳关系。动笔头可以促进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也会进一步激发阅读的兴趣，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创造者，进而形成读思结合、学用相长的良性读书习惯。

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同志曾殷殷嘱托领导干部，要读马恩列斯全集、读四书五经、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读《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2亿字，即便以一天读1万字计，要读完至少也需14年。他还说，20多岁的干部按这个方向努力，到40岁左右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毫无疑问，对大多数干部来说，这是一个高山仰止的目标。虽不能至，但只要心向往之，孜孜以求，从政生涯就会有声有色、才情横溢，整个人生也会因阅读而草木葱茏、气象万千！

来 源：《新华日报》（2016年5月10日16版）

责任编辑：贺亚慧

忧世之心 笑骂之言 劝善之意

——读《桃花扇底看前朝》

徐海娜

最近我读了许石林先生的历史随笔《桃花扇底看前朝》（后文简称许书）。该书益人神智、发人聪明、广人之识、动人鉴戒，值得一读。

“动人鉴戒”

“古代王朝的能量”讲了关于明代朱元璋、宋代赵匡胤以及明代洪熙、宣德帝的几个故事，让读者从人性的侧面看到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和中兴帝王所以能创造盛世的正能量因素。

“宋仁宗的饮食”讲了宋仁宗的几个小故事，一次是宋仁宗晚上饿了，特别想吃烧羊肉，但没有召唤侍臣，原因是宫内有任何要求都会被当成永例、制度供应不断。特别想吃而忍着不吃就是怕吃这一回，就让今后每晚杀羊成为制度。（“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还有一次，宋仁宗游园口渴，看到随行人员没有带烧水镬子，忍渴而归。嫔妃问起，回答说恐一说出就会有人受处罚，就没出声。许书总结，宋仁宗以自己的行止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尊贵，尊贵就是自律，是比他律甚至刑律更高的要求，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行己有耻”“有耻且格”。近几年落马的“大老虎”们，如果但凡有些许“自律”精神，能够“行己有耻”“有耻且格”，也不会于囹圄之中落下悔恨的泪水，成为举国观思的反面教材。

同样说饮食，“美食背后”讲到雍正皇帝一则小事。史评雍正为人峻刻，也并非全是贬损。峻刻是清廉、无欲的另一面。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很不喜欢浪费，他曾给内务府下诏，专门说后宫吃剩下的饭菜的处理问题。除了陈述反对浪费的道理，还有具体指示：后宫吃剩的饭菜，不

能浪费，打包给后宫保安、保洁等人员；他们吃不了的，可以给后宫豢养的宠物，宠物吃不了的，可以晒干保存，给园子里的小鸟去吃。食尽其用。时下，世界上饱受战祸之害的地区、欠发达的地区，仍有许多人包括婴儿因为食物短缺而死，而同时在其他物资充裕地区却仍然存在大量食物浪费现象，这个故事的教益并不过时，它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雍正这个“峻刻”皇帝的吝啬，反而是其深悉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的悲悯之情。

“发人聪明”

“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矣”中讲，曾国藩在教导李鸿章办洋务外交时，针对李的“痞子腔”说了一番道理：“圣人言忠信可施与蛮貊”，洋人亦通“诚”之人情。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虚强造作”，对方都会识破。不如推诚相见，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太过吃亏。脚踏实地，最终站得住的是自身的信用身份，此理古今相同。首先，体现在大的国家政策方面。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以“亲、诚、惠、容”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进行定调，做出了“中国周边外交顶层设计”。其中之“诚”与前人所说的均是以诚相待之“诚”。虽然中国今日之实力与过去不可同日，但“诚能动物”的道理依然。诚信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备要素，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可与之交”的身份名牌。无论内政外交，诚信无小事，其所涉及国民风气，经济活动、政府信誉、国家形象等，说是立国根本精神之一并不过分。其次，体现在做人行事方面。许书中总结，“虚强造作”就是心怀妄图，而“名于成败者，要在去妄。妄心干扰公心，公心未明，虽人君圣贤亦不免自我蒙蔽”。一旦存了妄心和私心，受声、色、势、利等外物，怒、爱等情感所扰，一定会蒙蔽心智，圣人也不能得免。因此去利、去私，存公心，是不让“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的最好办法。

“谨慎应酬无懊恼，耐烦做事好商量”这一小节中讲述了明朝兵部尚书刘大夏、绍兴乡绅胡罔卿、硕儒陈白沙面对突发的羞辱事件，以自身

的远见、宽厚的性情和如山的定力或远避灾祸，或免于折辱的故事。借此提出，“大凡经济俗务，非有耐烦忍辱的脾性不可，而读书人多止于洁身自好以为高尚，故遇事颇不耐烦，更不能丝毫忍辱”。准确地描述了许多读书人中存在的通病。这份忍耐功夫修养的缺失或曰不足，使读书人未能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与政务系统充分衔接，最大地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

“坚人志节”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中转引了诗人、学者刘斯翰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讲到宋代苏轼和王旦的君子之风。苏轼最初反对王安石变法，得罪改革派，被贬黜边远；后蒙召赐还，适逢变法失败，苏轼又在众谤声里为王安石和新法辩护，认为不应全盘推翻，又遭保守派排斥打击，再贬黜边远。与北宋名臣寇准同朝的宰相王旦珍惜寇准才情，对他屡次在皇帝面前告状为难自己毫不记仇，遇事说事，公允正直。苏、王二人行为正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这里的中庸之道并非骑墙，而是在胸襟宽广、气量宏大前提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仁者之道。唯如此，才能在汹涌的群体情绪中，从容地做到不偏不倚，而不是走极端、随大流。

其他如“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一辈子就为了的一个好死”，“所谓琴心——减少苟活的理由”，“守礼者无敌”等许多为“气节”和“正心”而罔顾个人利害的故事。这些掌故展现了众多尚义的古人，或可给尚利的今人多些触动与思索。

深情与信仰

文明的火种是人。先儒论人，以美德与学问为高，目的是培育士君子，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基石。人是制度的指向亦是制度的源头。这源头里的人是传续中华文明馨香并为中华民族光明未来不断添增火种的士君子。他们性情禀赋不同，但心志坚定，情怀相同，都怀揣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赤子之心。许先生其文其人有

士君子之风。

邹金灿先生在代序中说“一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亲近与否，取决于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无深情者即使雅好传统文化，亦难体察个中幽微之处”。许石林先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之道，需要人带着真情去寻找去传播去实践。越读到后来，越感到这种深情近乎信仰，在兴趣、热情和持久的投入中默默酝酿，醇厚炽热。在深情与信仰中，许先生为“玉成和勉励今日的士君子”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权势如何显赫，不管金钱如何堆积如山，不管学问如何渊深，终究只有美德才能让人尊敬，只有人伦大防才能阻止社会堕落”。

来 源：《学习时报》（2016年5月6日）

责任编辑：陈 阳

【理论特辑】

我国处于“脆弱性战略机遇期”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强调，我们“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尤为突出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三期叠加、三阱同现”的时期，处于一个可称之为“脆弱性战略机遇期”。

“（新）三期叠加”，指的是与前一个时期人们普遍所认同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内涵不同，笔者认为，“（新）三期叠加”应是“结构优化阵痛期、改革深化攻坚期、生态环境修复期”。

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在今天来看我们已经度过，我们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2011年的9.5%，迅速在2012年下滑到7.7%，2013年、2014年分别为7.7%、7.3%，2015年为6.9%，“档

位”可说是没有了较大幅度上升的可能，已经进入了中高速的通道，不能再换了。而金融危机时人为的刺激政策在2012年前发挥了短暂的促进增长的作用，如今显现的只剩下刺激政策失效后的一些与过去积淀的相同或类似的问题了。

结构优化阵痛期，是过去所说的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升级版”。不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作为还是被动应战，结构调整的目标指向是优化，适应范围是全球，再怎么“痛”都要向此调转。全球增长乏力，中国消费升级，前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围堵，后有更不发达国家的低端追赶，市场竞争激烈，技术更新加快，基础不牢、实力不强、文化不固的我国企业要在夹缝越来越小的大环境下存活，已实属不易，遭受破产、淘汰是其中相当部分企业的结局。伴随这一痛苦结局的相关人员，必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改革、稳定与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巨大冲击。

改革深化攻坚期，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整个经济社会的基本特

征，是各个领域全面改革，各项改革全面深化，各种利益格局、利益流向、利益流量深刻调整的一个特殊时期。不论是简政放权的推进、政治生态的优化、军队空前的改组，还是刮骨断腕的反腐，都必然会相应引起各方瞩目，产生持续高频、范围广大的震动。

生态环境修复期，是将我们已经恶化的生态和被严重污染了的环境进行修复和治理的特殊时期。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我们一再声称“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实际上又不自觉而迅速地走了这条路后的被迫选择。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我们虽然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但“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在退化、恶化、污染十分严重且仍然持续（“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而相关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全球生态安全迫在眉睫、民众普遍高度关注的情况下，决定了我们生态修复和

环境好转必然是一个需要立即行动、下大力气、巨额投入的系统性、长期性重大工程。

“（新）三期叠加”是我们必须勇于正视的艰难处境，而“三阱同现”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危险困局。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等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导致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长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序列的现象。2015年4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深入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后，得出了“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结论，而后来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的国际困境。长期

来看，中美关系有非常大的挑战：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如果快于美国，在世界日益联系紧密、利益格局定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意味着中美关系中存在着战略性的对抗和冲突。

未富先老陷阱，是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环境的改善，特别是1973年开始实际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形成了不是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却早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社会局面。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4年60岁以上人口达到15.5%，65岁以上已达10.1%，而且劳动力绝对数已经从2012年、流动人口从2015年开始下降，尤其是在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况下，生育意愿也空前低（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世界相关国家发展的历程证明，老龄化社会既是发展的新条件，更是发展的沉重负担，我们已在真真切

切的感受之中。如果说其他陷阱我们是有可能进入也有可能跨过，而未富先老陷阱是我们已经陷入其中，下一步是如何走出、何时走出的问题。另外，楼继伟之所以认为中国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为此，我们只有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运用智慧捕捉更多的机遇，超前谋划抓住更大的机遇，强化引导利用更好的机遇；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担当，戮力同心、奋发有为来应对叠加的“三期”；以更加沉着冷静的胆识、更加及时有效的举措，精心协调、扬长避短来应对同时显现的“三阱”，才能把控全局、赢得主动，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 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504期3版

作 者：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 崔伟华

参与全球治理处理好几个关系

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当中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这很重要。

第一就是处理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非常微妙。怎么协调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顺利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至关重要，否则会设置很大障碍。

第二是处理好中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改变规则之间的关系。我们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不代表必须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应该积极完善现有的国际规则，不要尝试完全改变。

第三是处理好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地位之间的关系，中国要积极发挥全球经济治理的作用，同时也要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第四是处理好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关系，这两者是互动的，两个新常态应该彼此引领。

第五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合作共赢的关系。

最后就是处理好中国的自身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关系，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做好，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有资本、有能力、有基础去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共同的问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而由大国变成强国。

《社会科学报》总第 1488 期
3 版

作者：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权 衡

“四条底线”让从政者更有“底气”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党员干部必须坚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这四条底线。（新华网4月10日）

法律底线不可碰。“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体现国家意志，体现人民意志，是党员干部的第一底线。任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的问题都会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在法律之下行使权力，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始终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的教训。

纪律底线不可踩。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体现着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是管党治党的一把“尺子”，也是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线。任何越权办事、搞非组织活动、放纵自己和身边亲属及工作人员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有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也必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所有党员干部都必须明白，党纪严于国法，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要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

政策底线不可违。“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是全党行动的准则，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不可违反、不可变通的底线。任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政策“擦边球”、钻政策“漏洞”的行为都是违反政策底线的，也是缺乏政治素养的表现。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敏感度，任何时候都要做到令行

禁止，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道德底线不可犯。“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中华民族历来崇德尚道，人们必须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一系列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坚守最基本、最朴素的做人做事道德底线。任何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的行为最终都会酿成恶果。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讲操守，重品行，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一方面，底线是做人做事的警戒线，不可碰、不可踩、不可违、不可犯。另一方面，守住了“四条底线”也就拧紧了为官从政的“安全阀”，党员干部说话做事才会更硬气，干事创业才会更有胆气，为官从政才会更有底气。

来源：荆楚网（2016年4月12日）

作者：樊建飞

社会转型的代价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

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六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从公有社会向混向社会转变；从首长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其中，第一、二、三种趋势是社会体制转型的主要向度；第四、五种趋势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向度；第六种趋势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向度。这六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社会转型效果的评价。

社会转型付出的代价则包括：

(1) 失业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

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 社会分化

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

(3) 犯罪

有三种犯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随着民工潮发生的“进城农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乡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职务犯罪率升高。这三种犯罪现象都同社会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可以视之为社会转型的代价。

(4) 社会不安

有三种具体表现：一是通货膨胀率，这往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代价，我国上世纪80、90年代都曾经付出过比较高的代价，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缓解了；二是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有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标；三是群体性突发事件。近年来，因就业、收入、城市拆迁等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所加剧。

(5) 社会公害

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社会公害是“发展病”。英国工业初期，出现了人们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伤害的污染现象，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目前，我国水、空气、食物污染与土地荒漠化等社会公害，正日益受到重视与治理。社会公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从公害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则是消化社会代价的表现。

考察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今后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化过去社会转型

带来的社会代价，三是为了对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进行监测与预警。“科斯定理”认为，制度安排各异，人们的行为或选择便不同，随之产生的价值与代价也会相异。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于使矛盾的两极之间维持一定的均衡，这是有道理的。减少、消化社会转型的代价，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于科学、合理的新的制度安排，还需要从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中引申出一个“群众定理”：改革要使大多数人受益，政府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社会阶层承担的改革的代价与受益必须相称。

来源：《社会科学报》2002年6月6日

作者：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宋林飞

责任编辑：马海波

主 管：自治区党委讲师团

主 办：自治区党委讲师团

主 编：朱天奎

副 主 编：刘克敏 陈 文

执行主编：马海波

编 辑：（按姓氏笔画为序）

宋海萍 宋武平 陈 阳

贺亚慧 赵志斌 胡剑锋

潘建红

编辑出版：理论与宣讲编辑部

准印证号：宁新出(金)[2016]第132号

发 行：包相军

地 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康平路1号

电 话：(0951) 6669751

(0951) 6669748

邮 箱：nxjstjys@163.com

邮 编：750066

印 刷：宁夏区党委机要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